

中國小說史簡編



南开大学中文系

I207.409/2

中国小说史简编

南开大学中文系



人民文学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15120

715120

封面设计：溪水

中国小说史简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字数 226,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2 插页 2

1978年5月北京第1版 197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00,000

书号 10019·2775 定价 0.77 元

前 言

我国的小说源远流长，根深叶茂。从小说的雏型魏晋六朝志怪、志人小说算起，已经有一千五、六百年的历史；从宋元话本产生以后，我国的小说更是大放异彩，到现在也有七、八百年的历史了。我国的古典小说作家，人才辈出，其中伟大的作家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他们描绘的生活图画十分真实，他们塑造的典型形象深入人心，他们的艺术技巧卓越而多样，民族风格独特而鲜明，从而大大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对于这份珍贵的小说遗产，我们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给以批判的总结。



我国的古典小说虽然产生于千百年以前，但是，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广大人民来说，仍然具有历史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也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优秀的古典小说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形象的历史。它通过艺术的典型化的方法所反映的社会历史生活，比一般历史著作要更强烈、更集中、更典型、更带有普遍性，因而能够

广泛深刻地揭示社会的某些本质方面，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具有不同程度的历史认识作用。所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总是把历史上的优秀古典小说当作历史来研究的。恩格斯在给玛·哈克奈斯的信中论述到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时说：它“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通过艺术形象反映的法国社会的历史，要比历史教科书的记载更具体、更丰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463页）列宁在1908年到1911年写了一系列分析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创作的论文，深刻地指出了托尔斯泰主要是属于1861—1904年这个时代的，“他作为艺术家，同时也作为思想家和说教者，在自己的作品里惊人的、突出地体现了整个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它的力量和它的弱点。”（《列·尼·托尔斯泰》，《列宁全集》第16卷第322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列宁提出了“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这个著名论断。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国古代小说及其研究工作，历来十分重视。一九五四年毛主席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这篇光辉文献中，总结了文化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经验，清算了胡适、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一系列错误观点，为正确研究《红楼梦》指明了方向。在我国国民经济遭到暂时的困难，帝、修、反反华的时候，

毛主席亲自指导编选《不怕鬼的故事》，亲自修改序文，用《列异记》、《幽明录》、《聊斋志异》等作品中敢于驱鬼、打鬼、捉鬼的故事，教育人民对于一切“鬼类”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毛主席还亲自解剖典型，对《红楼梦》、《水浒》等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和评价，从中引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教训。

鲁迅先生对于我国古典小说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估计。他说：“……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320页）因此他主张“从小说来看民族性”（《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319页）。鲁迅还针对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压制、排斥所造成的“中国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系统地整理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史料，并在此基础上编写了《中国小说史略》，认真研究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对它们作出了历史的分析和评价。这个工作在我国古代小说的学术研究上具有首创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鲁迅先生对待优秀的古典小说的态度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深刻的启示。

我国很多优秀的古典小说，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反映了当时各个阶级、阶层、政治集团等各种社会力量的复杂关系，揭示了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还是小说雏型阶段的魏晋六朝的志人小说，就真切地反映了

魏晋时期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以及统治集团的残暴和荒淫。特别是它们对士族豪门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的描绘，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一些侧面。到唐代，不少作家开始有意识地创作小说。他们逐步摆脱只是记叙鬼神或片断地描写人物言谈举止的狭小范围，而去表现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他们提出了反对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要求爱情婚姻自由，揭露腐朽的官场生活的具有社会意义的主题。有些作品还描绘了唐代封建社会从极盛到急剧衰落的历史转折时期的侧影。宋元时代，商品生产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扩大，给小说创作带来了新的发展变化。当时的话本小说在题材内容、语言运用和形式风格上都与唐人传奇不同，而具有新的特征。在话本小说中，下层人民第一次作为主角成批地出现，突破了六朝小说和唐传奇的局限于描写社会上层的框子。话本小说的创作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正是在这个背景上，显示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本来面目。明代中叶以后，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长篇小说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中“世情小说”反映了封建制度在货币关系侵蚀下的日益衰朽和腐败，初步民主主义思想正在成长，争取作人的权利的斗争和新的婚姻观念愈来愈成为小说表现的重要主题。《三国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概括和熔铸了较长时期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集团之间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它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封建社会的历史，丰富我们的斗争经验，而且对认识剥削阶级的实质

也有所帮助。在清代，文人独立创作的小说达到了十分成熟的阶段。一些优秀作家在当时的进步思潮影响下，以小说为武器，对封建社会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揭露与批判。他们认识生活和概括生活的能力较前代又有所提高。蒲松龄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借花妖狐魅的故事，大胆地揭露了腐朽黑暗的封建政治，寄托了对于美好生活的希望。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以讽刺科举制度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中心，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封建制度走向灭亡的历史趋势。曹雪芹的《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作者通过贾府这个典型的贵族之家，深刻地表现了封建社会解体过程中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生活风习和阶级关系的变动。围绕着四大家族开展的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实际上就是当时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一个缩影。读一读《红楼梦》可以使人了解什么叫封建社会，什么是封建统治阶级，什么叫阶级剥削和压迫，认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总之，优秀的古典小说所表现的各个时代具体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的生动图景和性格鲜明、丰富多样的人物面貌以及五光十色的生活风习，有助于我们认识社会历史的某些本质方面，具有一般历史著作所不能代替的作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历史经验（包括文艺的历史经验）可以增进我们对历史辩证法的了解。因此，我们应该把优秀的古典小说作为历史来读，这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古代和近代阶级斗争的认识，吸取过去时代人民斗争的经验和智慧，继承前人的奋斗精神和

优良品德，从而达到总结阶级斗争的规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小说同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小说的发展历史来看，一种新的思潮的出现往往迅速地投影在典型的艺术形象上。比如《红楼梦》，它产生于我国清朝乾隆时期，那时中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还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出现大观园中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是产生贾宝玉这样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新旧两个社会在转变交替时期的矛盾，即封建主义旧制度的逐步瓦解和崩溃，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在作者的理想人物身上都有或明或隐的反映。贾宝玉就是一个承受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潮流而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力量的代表，在他身上体现了初步民主主义的思想，但他又孕育于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因而在他身上不可避免地残留着古老封建社会的深刻烙印。在浪漫主义作品中，某些社会思潮也往往附着在虚构的幻想性的艺术形象身上。神话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在孙悟空身上倾注的对于人才的向往，同他那个时代的一部分思想家对于人才问题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与吴承恩同时而稍早的王廷相曾经说过，能够乱天下的人，多是“才智之雄”，朝廷只要将他们“尽畜而有之”，就可以安天下。（《慎言》卷七）与吴承恩同时而稍晚的李贽甚至称赞海盗林道乾“才识过人，胆气压乎群类”，如能使用他，“朝廷自然无四顾之忧。”（《因记往事》，《焚书》卷四）吴承恩没有象他们这

样用逻辑的语言阐述这种思想，却通过小说的艺术形象达到了相近的结论。因此，读一点小说和小说史，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上代表各种阶级力量的思潮和学派，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某些侧面。

毛主席曾用“推陈出新”这个成语表述了新文艺与旧文艺、新传统和旧传统之间的革命发展的过程。今天的小说，是历史的小说的一个发展。推陈而出新，旧小说演变为新小说，离不开对中外文艺遗产的批判继承和借鉴，而文学的艺术技巧和艺术形式在民族范围内又有比较直接的继承性。我国小说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鲜明的民族形式和风格，这是古代小说高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反过来它又培养和形成了本民族读者的审美习惯。我国古代小说由于受宋元以来“说话”艺术的影响，在人物描写、情节结构、文学语言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其中凝结着几代人的心血，包含着千百次探索的艺术经验，因此，批判地吸收古典小说的创作经验和艺术技巧，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学的必要条件。

俗语说：“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古与今是对立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是革命的批判的学说，它不但敢于批判旧世界，而且敢于用批判的态度去吸取人类古往今来的一切知识财富，用来武装自己，变成自己手中的武器。这就是我们读点小说和小说史的意义。

二

无产阶级要不要批判地继承人类有史以来优秀的文化遗产，革命导师在这个问题上有着一系列光辉的论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就是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正确的方针。早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毛主席就已对这一马克思主义方针作了纲领性的说明：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这是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完整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我们学习小说史所必须遵循的指导方针。王张江姚“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在对待文化遗产的问题上也蓄意反对批判继承的正确方针。他们先是大搞民

族虚无主义，随意割断历史，提出“横扫”和“砸烂”的反动口号，把过去时代的一切文化遗产都不加区别地斥之为“剥削文艺”，并炮制了“彻底批判”的谬论，不准人民群众接触古代文化遗产，妄图用愚民政策来培养他们需要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到了一九七四年，为了配合他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另搞一套的政治阴谋，又在哲学、史学领域里大搞以“儒法斗争”划线，并把“儒法斗争”扩大到古代文学领域，侈谈文学史上的所谓“儒法斗争”。他们采用实用主义的手法，不顾历史事实和作品实际，牵强附会，无中生有，千方百计把《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纳入“儒法斗争”的轨道。不仅如此，“四人帮”还以评论古典小说为名进行篡党夺权活动。自诩为“半个红学家”的江青，借谈“红学”之机，恶毒影射和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一九七五年八月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评论发表以后，“四人帮”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抢过旗帜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他们肆意篡改、歪曲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水浒》“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到了姚文元的笔下却歪曲成“宋江排斥晁盖”。江青甚至窜到大寨胡说什么：“《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中央就有人架空毛主席”。“四人帮”编造的这个“架空论”分明是打着“古为今用”的幌子，大搞古为“帮”用，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大造反革命舆论。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制定的“古为今用”，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必须彻底肃清“四人帮”反党集团所散布的反动谬论。

我国古代小说在数量上浩如烟海，积累的时间又特别长，它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社会。各个历史阶段的各个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思想感情和生活都有所反映，而且在内容上往往瑕瑜互见，精华和糟粕杂揉。这就要我们在读小说和小说史时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努力做到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革命导师关于文化遗产的学说。

批判地继承小说遗产，首先要求我们贯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是研究阶级社会里一切社会历史现象的普遍适用的方法，也是唯一正确的科学方法。读小说和小说史只要紧紧把握住贯穿于人类历史的阶级斗争这个纲，我们就能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出它的规律性。学习小说史，就是要弄清在各个历史时代小说和阶级斗争的相互作用，了解小说是怎样为阶级斗争服务的。为此，我们首先应当从阶级斗争的意义上区分出古代小说中的精华和糟粕。一般说来，作品中凡是歪曲现实，丑化人民，反对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仇视进步事物，美化反动统治和阶级剥削，宣扬腐朽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就是糟粕；作品中凡是不同程度地再现了生活的真实，不同程度地歌颂和同情人民的反抗斗争的，直接和间接地表现了被压迫者的要求和愿望的，是古代小说中的精华。我们所要继承和借鉴的，就是上述这些优秀的、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遗产。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要求我们对具体情况进

行具体分析。批判地继承小说遗产，目的在于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和艺术经验作为今天的借鉴。这种借鉴，应当是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结合，“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对古代小说作具体的阶级的历史分析，决不当把古今等同起来，作肤浅的历史对比。因此，在读古典小说和研究小说发展的历史过程时，必须联系古代历史环境和阶级关系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把作家和作品放在阶级斗争的具体环境中加以考察，弄清作家是站在阶级斗争的哪个方面，对谁有利，起着怎样的作用，倘若是进步的，那么他比他的前辈作出了怎样的贡献，在政治观点和艺术上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对后代有何启示，他的具体局限性怎样限制了他，这种局限性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实践水平，还是阶级偏见对他的阻碍等等。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我们，对待古代小说，一方面要分析某种作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进步作用和它的局限性或反动性；另一方面还要分析它对当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现实作用。只有同时注意这两个方面，才能避免片面性，才是完整的革命的 and 历史的观点。还应看到，历史上曾经是进步的东西，有一些在今天固然仍有积极意义，但是有些则随着时代的推移，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减弱了它的积极意义，有一些甚至走向反面，只能起消极的作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考察古代小说在当前的作用，并非要贬低作品应有的历史地位，更不是企图以今天的条件去苛求古人为

什么没有提供只是在今天才能有的东西，而是实事求是地对古代作品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各种影响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批判。因此，要求今人正视古代小说在现实中的影响，抵制它们在今天的有害的作用，与错误地用现代的条件去要求古人，是两回事。

三

早在三十多年前，毛主席就指示我们：“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注重用历史的经验教育我们的党员和干部，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我们正处在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新时期，我们的同志掌握一些历史知识，包括小说史的知识，对于了解社会阶级斗争、丰富斗争经验和充实历史知识是有所帮助的。

我们正是遵照毛主席读点古代小说和小说史的指示，尝试编写了这本普及读物，目的是为广大读者学习古典小说和小说史提供一点参考。

小说史作为一门科学，它的最高任务是发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规律，诸如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内部矛盾是什么，怎样由于各种矛盾的变化而显示出小说发展的阶段性，小说的“源”与“流”的辩证关系等等。由于我们对社会历史和小说的美学原理缺乏深入研究，小说史资料掌握得也不

多,因此这些问题在本书中都没有得到较好的阐述,这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进步小说同反动小说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两者壁垒分明,同时又呈现着错综复杂的情况。我们根据鲁迅先生处理小说史的意见,即“不理睬这些糟粕,——虽然它还很受社会欢迎——而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因此,我们主要是把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小说作为贯穿线索进行叙述,对那些充满封建糟粕的作品或反面教材,只是就其有代表性的作品或这类作品集中出现的时期,概括地做了一些说明,没有让它们占据更多的篇幅。但是,我们也深感,我们对小说史领域的阶级斗争展示得很不够。此外,有些作品,如《金瓶梅》,虽然在小说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在今天也还有相当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上的借鉴意义,但是又因为其内容上的消极面过分严重而不宜在一般读者中普及。考虑到本书是普及性的读物,对于这类作品,我们也未予介绍。

这是一本通俗读物,但是在如何搞好通俗工作方面,我们还缺乏经验,还没能象列宁所要求的那样,“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易懂的推论或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从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结论,启发肯动脑筋的读者不断地去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评〈自由〉杂志》,《列宁全集》第5卷第278页)这也应当作为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编写本书使我们获得一次学习的机会,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是前无古人、启迪

后来的开山之作。这两部著作的丰富的内容、深刻的思想、精辟的见解、战斗的风格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给予我们以极大的启示和教育。解放后一些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的专著，以及中国古典小说评论，对我们编写这部小说简史也有很大的启发，我们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它们的研究成果。

由于我们的思想、业务水平不高，对古典小说的认识和理解还很肤浅，对于完成这项任务是有不少困难的，因此，这本小册子一定存在着许多缺点和错误，我们切望听到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先后参加本书讨论和编写工作的，有我系古典组部分教师、文学专业部分同学和天津碱厂部分工人。负责修改、定稿的是宁宗一、郝世峰。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蒙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同志多次提出宝贵意见，深受启发，于此敬致谢意。